

·文献学苑·

论阮元在文献纂刻方面的成就

李海燕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阮元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主持纂刻了大量文献,为学术成果的保存和文化遗产的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梳理并总结了阮氏在文献纂刻方面的成就、从事纂刻的缘起及其纂刻思想。

关键词:文献纂刻 阮元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8)02-0130-04

The Achievements of Ruan Yuan in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Li Haiy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Ruan Yuan wa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Jiaqing and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 He had presided to compile and engrave a lot of literature, and in this wa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nserve the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and spread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his achievements, the reasons and ideas in hi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Key word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engraving; Ruan Yuan

CLC number: G256.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8)02-0130-04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别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节性斋老人、北湖跛叟,谥号“文达”,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①阮元生于乾隆中叶而卒于道光晚年,此时已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主张实学,所至提倡经学,主持风气,兴学教士,力持不懈。他治学开明通达,广博贯通,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乾嘉学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阮元在文献纂刻方面的主要成就

侯外庐曾指出:“从学术内容和写作年代上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②阮元一生主持纂修或支持纂修了很多方志书、金石书、诗文集、工具书等,如《雒海英灵集》、《浙轺轩录》、《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等,蔚为大观。其编纂的三部大书《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416卷、《皇清经解》1400卷,基本上囊括了清代前期经史训

诂研究的重要成果。

1 《经籍纂诂》

该书是阮元任浙江学政时,组织编纂的一部规模巨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其主旨是为保先人训诂之成果,不至于因为语言的变化而遗失。

早在阮元之前,戴震就曾倡议汇刻诸书训诂,朱筠任安徽学政时也有志于此,但都未能实现。阮元在内廷供职时,也曾着手此事,但中途因故搁置。及至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利用公务之暇,才完成了这一重大工作。

《经籍纂诂》条理分明,体例谨严。编次文字,依《佩文韵府》之法,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106部,以一韵为一卷。凡《佩文韵府》中未收的字,据《广韵》增补;《广韵》中未收的,则采《集韵》补入,所以该书收的字是较多的。一字数音的,按其音读归入各韵,并依字义不同,分别注释。各字之下,分别各种

古文异体。王引之称其“据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6]臧庸更是赞其为“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7]《经籍纂诂》的最大特点，是唐以前的文字训诂，差不多都囊括其中了。另一重要特色是吸收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清代训诂学的一大成就是发明了因声求义，由是“阮元在凡例中力主‘声音训诂，一以贯之’”。^[8]由于《经籍纂诂》的上述特点，所以至今仍是训诂学的重要工具书。

2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经书雕版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倡导，刻印者不少，但因刊刻中辗转相刻，讹谬百出，至汲古阁毛氏本，有的已经不可识别。

阮元早年习经时，就已留意手校经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职翰林院，他分校太学石经，以唐石经及宋版全力校勘，比早年校勘获得更大的成绩。嘉庆六年（1801年）任浙江巡抚期间，阮元遍求善本，选江浙长于校经之士臧庸、顾广圻等人，分任其事，由段玉裁主持，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17卷，附《孟子音义校勘记》1卷、《释文校勘记》25卷。此《校勘记》是依照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做法写成，是一部目录学、版本学与校勘学的集大成著作。皮锡瑞评价说：“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9]

阮元在江西任巡抚时，又组织了擅长校勘的学者卢宣旬、黄中杰等人，重刻了宋本《十三经注疏》，并将他所撰的《校勘记》附于全经之后。历时19个月，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天刻成，共416卷，使宋本注疏复行于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通行本。但由于匆忙付梓，书中还是多有讹讹。阮元任两广总督时，邮书江西，指出前刻本之错误93条。^[7]

阮刻《十三经注疏》问世后，当时及后代对此多所嘉许。晚清张之洞将其列入指导读书门径的《书目答问》，认为“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8]

3 《皇清经解》

经学是清学的核心，阮元于此也是用力最勤，其重大贡献是辑刻了《皇清经解》，很好地保存了研究成果。因汇刻于广东学海堂，又称《学海堂经解》。

此书始刻于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由严杰任总编，吴石华为监刻，学海堂诸生充任校对，孙成彦管理复校，阮福则总理收发书籍诸事。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阮元奉调改任云贵总督，辑刻之事托付给广东督粮道夏修恕，总编仍为严杰。道光九年（1829年）九月刻成，历时四年。编纂次序上按照作者生年之

先后排列，是编以人之先后为次序，不以书为次序。凡见于杂家、小说家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编录，计1400卷。^[9]

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由于英军攻粤，原存书版毁失过半。咸丰十年（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捐资补刻数百卷，并增刻冯登府著作7种，计8卷，此即“咸丰庚申补刊本”。同治九年（1870年），广东巡抚李福泰刊其同里许鸿磐《尚书札记》4卷，附诸《皇清经解》之后，是为“同治庚午续刊本”。

《皇清经解》的内容除经学之外，还涉及小学、校勘、史地、天算、金石诸方面，汇集了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等73位著名学者的著作，共达183种。也有学者指出，书中“有割裂，亦或选择未周，间有遗漏”，^[10]如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指出，遗漏了直隶翁方纲的考证学著作。但作为清朝经学研究成果的汇集，《皇清经解》为今天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详实的文本依据。

阮元不仅精于经史训诂之学，而且还是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倡导者，于嘉庆二年（1797年）开始编纂《畴人传》，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年编成。该书共46卷，辑录了自黄帝至清中叶中西天文历算家280人的传略，其中包括西洋37人。《畴人传》是我国科技史上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清代学术概论评价道：“阮元著《畴人传》，罗士琳续补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11]

此外，阮元刊刻了当时众多学者的著作，使得这些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的学术成果得以公之于众，功绩不可磨灭。从阮元的编撰刻书成果来看，搜罗宏富，卷帙浩繁，反映出了乾嘉考据丰硕的研究成果，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也为保存、传播乾嘉汉学的成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阮元从事纂刻的缘起

阮元在长期的仕途生活中，时时以倡导学术文化为己任，汇刻了大量的文献典籍，是其一生最值得骄傲的盛德，也受到了史家的称赞。《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

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轶闻录》、《雒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欽定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篇，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12]

阮元之所以可以在编纂上作出这样的贡献，与他身居高位、积极办学、搜求藏书等是密不可分的。

1 宦宦生涯 身居高位

阮元的一生被概括为“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在清代学者中，阮元是一位年少早达、位极人臣的显宦。

阮元幼承家学，后相继问学于乔椿龄、李道南。家学师教，确定了阮元早年的文学藩篱。后来，阮元又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如凌廷堪、谢镛等，他博采众家之长，学向日臻成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从此，阮元历任中外，开始了漫长的宦宦生涯。

阮元为官五十载，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病足而获准致仕。丙午重宴鹿鸣，晋加太傅。除了任浙江巡抚期间，因刘凤诰科场舞弊案失察被冷落不到两年外，阮元的宦海生涯可谓一帆风顺。

他86岁逝世后，清王朝誉其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身份，阮元幕府成为清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学术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个“学人幕府”，前后曾有一百二十多位学人在其府内效力，这些学者成为阮元编纂事业的中坚力量。

2 积极办学 开创学风

《靖史稿》中记载，阮元“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3]

嘉庆六年（1801年），阮元选择西湖白沙堤清行宫之东建诂经精舍书院。此处原是阮元任浙江学政时召集诸生编撰《经籍纂诂》的地方，“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此名的来历是：“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勘新知也。”^[4]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仿诂经精舍旧制而兴建学海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5]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阮元创办的极有影响的 two 所书院。这两所书院专勉实学，不习为科举服务的八股时艺，在选才、教学、考试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对于改变当地的学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是由于阮元致力办学，堂中士子成为其编纂事业的得力干将，严杰等便是精舍的学生。

3 搜罗藏书 毕生不倦

阮元藏书，毕生乐此不疲，筑文选楼藏金石图书及宋元精槧旧本，一般书籍则藏于居所福寿庭。阮元藏书的旨趣是为编著服务，搜寻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籍。

在山东学政任上，虽然时间短暂，但他利用编撰《山东金石志》的机会，征集到大量金石文字拓片，同时也搜罗到不少有关金石文字的书籍。经毕沅说合，阮元父为之聘衍圣公孔昭焕孙女孔璐华为继室，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使其获得了孔府所藏宋十行本《十一经》。此《十一经》曾由著名校勘家卢文弨手校，上下四旁，朱墨交错。

阮元曾数次登天一阁，并重新摹刻阁内所藏石鼓文拓本，置于杭州府学和扬州府学，还于嘉庆二年命范氏弟子编录天一阁书目，总结天一阁的藏书经验。阮元在浙江任上时，有计划地寻觅《四库全书》未收书籍，搜购秘书，购得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集成书目并据此撰成《四库未收书提要》。这些书都录有副本藏存在文选楼。

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元抚浙期间，翁方纲提议，其《复初堂记》刻成后，藏一部于灵隐寺。由此缘起，阮元着手建立了宏大的灵隐书藏，并订立了书藏条例。4年之后，阮元又仿灵隐书藏在焦山建立书藏。

4 治学求实 通博创新

对于清代学术，张舜徽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6]扬州自古人才辈出，推动了扬州文风的兴盛，确立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阮元是扬州学派的开派人物之一，扬州学派治学有“创新”和“通博”两大特色。前者如焦循的研究《周易》，黄承吉的研究文学，后者如王念孙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正是由于“通”和“创”的治学特色，使得阮元在治学中可以吸取百家之长，不立门户之见，持平汉宋，总结乾嘉学派的学术成绩。

阮元思想之最可取处，是注重实践，不尚空谈。他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室名‘研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7]考据是实践，著书立说也是实践，而整理文化遗产更是重要的实践之一。

三 阮元的文献纂刻思想

在厘清了阮元在文献纂刻方面的主要贡献，并且对其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进行溯源之后，还有必要对阮元的文献纂刻思

想进行探讨,以期对现今的编辑、校勘活动有一定的启示。

1 广泛搜罗旧本,力求善本

嘉庆十年至十一年,阮元丁父忧,居雷塘,读黄丕烈刻《钦定四库全书》,与友人合作,取明黄正色本密加誉校,知黄本舛误甚多,至不可读。阮元全依宋本,不改一字,整理并刊刻了此书。

在校勘十三经时,阮元几乎将历代精校之本网罗毕至,所据版本之富有可谓空前。据考证,所集各经版本,少则8、9种,多至10数种,总计达126种之多。其所藏南宋十行本十一经,乃诸经中最古之册,借之于苏州黄丕烈的《仪礼》、《尔雅》二经北宋单疏本,为贾公彦、邢昺之原书,此二经更在宋“十行本”之前,为诸本中之最好刻本,并以盐巡胡稷从吴中购得的《十一经》补自己藏本的残缺部分。^[8]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校勘的质量。

2 不存门户之见

作为乾嘉学派总结者的阮元,不囿于汉、宋之门墙,认为汉、宋二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这些都反映在其整理文献工作上。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集各家精校之本,析诸家研经之说,惟善是从,兼容并包。无论是汉儒的郑玄、王肃,还是本朝的吴派、皖派,阮元都能抛开门户之见,做到汉、宋兼采,唯求其是。如他对惠栋的校勘成果完全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排斥。对一些名不见书传的小人物的见解,只要是卓有创见的,他都能积极采用,以正权威学者之误。这就使得他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最大限度地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为历代校勘十三经的集大成之作。

3 不凭主观臆断

阮元主张整理文献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在校勘古籍时则须科学严谨。校勘者应当具有文字、音韵、训诂的深厚基础,才可能对古代文字形体、音读、意义的了解,把握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对于发生的错讹有正确的判断。

由于古书流传年代久远,版本众多,同一字体往往形体各不相同,加之历经了抄书者、刻书者、引书者、校书者之手,错误不可避免。阮元凭借自己对古代文字、音韵、训诂的精深研究,从字体演变和古音通假入手,对文字异同加以辨析,指出孰正孰误,并且力求回复书的原貌。如十三经中的《周易注疏》,阮元取用唐、宋、元、明经本、经注本、单疏本、经注疏合本来进行校对,“各刻同异,属元和生员李锐笔之,为书九卷,别校略例一卷,陆氏释文一卷,而不取他书妄改经文,以还王

弼、孔颖达、陆德明之书。”^[9]

同时,鉴于宋明士子校书凭主观臆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阮元极力主张校书不改字。并且自创新例,在讹误字之旁,别加记号,使读者可以按记号所指,去核对校勘记,以便研究者考订。他说:“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10]

阮元还开拓了金石文字校勘古籍的途径,利用各种石刻文字和金属器物铭文来校勘古籍,为后世所重。

4 组织人才,发挥集体智慧

阮元一生问学之友很多,与其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几乎都与之有过不同的交往。《经籍纂诂》、《皇经清解》等书都是由阮元本人作整体的策划布置,手定凡例,分书类辑。其次,他利用自己的官僚地位,聘请名人学士完成具体的编纂、辑录工作。

《经籍纂诂》便是由阮元亲自拟定了该书的24条凡例,由何兰汀、朱为弼等33人分头摘抄有关古籍中的注释性文字。分纂工作完成后,阮元又延请擅长训诂之学的臧庸任总纂,成《经籍纂诂》106卷。他把稽古之学与政事之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集体的智慧。

5 刻书求全

刻书求全,亦是阮元极其看重的。《读书敏求记》是清初江苏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所作的一部善本书解题目录,是研究我国古籍版本学的重要著作。严杰藏雍正四年赵孟升所刻《读书敏求记》,曾据黄丕烈所藏钱曾手订原稿校读,并下朱笔补正于书中。阮元见此刻本,即命子阮福重雕。阮氏刊本比赵本多出三十余种,如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丁度《集韵》等书皆赵本所未载。十年后,阮氏父子觅得秦恩复五笥仙馆藏钞本,与道光五年自刻本校读后,又得易类十一条,诗文评类六条,均补刻于后,则可称完璧。著名目录学家叶德辉赞曰:“而终以阮刻为完全”。

道光十三年,阮元已年届七十,正值云贵总督任上,他写了一首《和香山知非篇》的诗,其中几句是:

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

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

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11]

阮元汇刻三千卷书,是我国文化事业上的一大盛事。而据我们今天的统计,阮元的“刻书卷三千”仅仅是比较粗略的估计,事实上阮元刻书总数远远超过了(下转第144页)

自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与普及,网络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也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阅读,人们渐渐开始从手持纸卷到面对电脑屏幕进行阅读。文本形态的每一次变化,对阅读都是一次冲击,这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对于网络阅读的研究,该书单列一编,论题涉及网络阅读研究综述、blog阅读、高校BBS阅读研究等,具体而微地深入网络阅读研究。

关于理论方面,有论传统经典阅读问题(王余光的《传统经典阅读论》),从信息时代人们心灵的飘摇无根,需要阅读谈起,到阅读的变迁,兼及各种推荐书目中的传统经典,最后落脚论述到阅读传统经典理论的必要性。还有关于阅读史研究指导的《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以此构建了中国阅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它包括社会环境与教育对阅读的影响、社会意识与宗教对阅读的影响、文本变迁与阅读、学术知识体系与阅读、中国阅读传统、个人阅读史等内容,为人们从事阅读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阅读学是一门实用的学问,人人都需要阅读,人人都与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深刻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理论研究,更需要实际方法的研究。书中吴永贵的《关于编制家庭推荐书目的思考》,刘洪权的《新世纪的中学生该读什么书》等,无疑给家庭藏书和中学生阅读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上接第133页)三千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八》中表彰:“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成为乾嘉经学的旗帜。”^[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章中则更全面地总结了阮元的一生成就:“芸台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23]阮元在整理文献、刊刻著作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总结了汉学成就,成为令人景仰的著名学者。

参考文献:

- [1] 阮元.扬州北湖小志序[A]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391.
- [2]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7.
- [3] 王引之.序[A]阮元.经籍纂诂影印本[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卷首.
- [4] 臧庸.后序[A]阮元.经籍纂诂影印本[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卷首.
- [5] 阮元.凡例[A]经籍纂诂影印本[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1-2.
- [6] 皮锡瑞.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1.
- [7] 湛三元.阮元与图书编辑学[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2):3-9
- [8] 张之洞.范希增补正.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该书论题广泛,都很有价值,对读者也有启发。如李雅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儿童读物的出版与阅读》,从民国的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之儿童读物出版入手,探讨那个时代的儿童阅读状况。当时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比肩于世,也出版了大量的儿童读物,如《小朋友文库》、《小学生丛书》、《中华少年丛书》等。当时号称为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中,有三大杂志就是专门为少年儿童编辑出版的——《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中华学生界》。我们何尝不可以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儿童读物出版进行梳理研究呢?对当时出版界两颗双子星都进行研究,将能更全面地窥见那个时期儿童的阅读状况。编者在后记中说:“我们对阅读文化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之功。”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关注中国阅读文化研究,以此为启迪,我们对阅读文化的研究将取得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 [1] 刘石.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思想[A],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128—141.
 - [2] 傅璇琮.从《学林漫录》丛刊到《书林清话文库》[A]徐雁.《苍茫书城》代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 [9] 阮元.皇清经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卷首.
 - [10]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五)[M]济南:齐鲁书社,1994:379.
 - [11][15][22] 梁启超.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7,50,54.
 - [12][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六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421-11424,11424.
 - [14]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A]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547.
 - [1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
 - [17] 邓经元.点校说明[A]阮元.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1.
 - [18] 陈志辉.阮元与《十三经注疏》[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4):48-50.
 - [19]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A]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254.
 - [20] 阮元.重刻宋板注疏总目目录[A]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首.
 - [21] 阮元.文选楼刻本研经室续集:卷十[A]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56.
 - [2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478
- 作者简介:李海燕(1982-),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